

朱德军官教育团办学始末

□ 黄 鹂

在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中段，坐落着一处重要革命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这处旧址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属的五处革命旧址之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作为1927年我们党在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朱德军官教育团培养了1000多名军政骨干，其中大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7年1月，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被中共中央委派往南昌工作。当时驻守江西的是朱德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时的同窗，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的部队。朱德抓住当时朱培德急于扩充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心理，向他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这一建议获采纳。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朱德以原江西陆军讲武堂校舍为校址，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担任团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朱培德的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领导，成为我们党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阵地。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教育团创办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也积极前来报考。1927年初，学校正式接收学员。同年2月，仅创办一个多月的军官教育团就接收了学员1100余人。全团共编为3个营。第一、二营共700余人，学员多数来源于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他们大多数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是学兵营，400余人，大部分是从各地选拔的决心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军官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



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经过测验，再逐个考察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考核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

当时，军官教育团里的共产党组织虽然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动是带有秘密性的。办学期间，在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陈奇涵（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等人的领导下，军官教育团各营各连队迅速秘密建立起党组织，积极发展进步学员入党。最初，每个连队只有几名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学期结束时，每个连都已发展到十余人，有的连队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了学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赵镗（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等学员就是在这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官教育团非常重视学员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办学之初，朱德明确指出：“我们办校必须为革命，不能因袭旧规。我们必须注意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所学生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军官教育团最初的教学计划基于旧式教学理念，只是填鸭式的“三操两讲”，强调“服从”。朱德认为，这样因袭旧规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革命。因此，他将“三操两讲”改为“三操四讲”，增加了政治课的内容。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

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授课中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势，教育学员既要坚持长期革命的思想，也要保持终身为革命的坚强意志。朱德不仅注重政治教育，而且重视实践教育。办学期间，朱德曾派学员到附近县做群众工作，开展工农运动，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1927年4月，为震慑国民党右派势力，朱德还率军官教育团部分官兵前往抚州临川一带剿匪。这些举措既让学员们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更拉近了官兵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为日后开展工农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他还邀请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人授课。在军事训练中，军官教育团以《步兵操典》为教材，对学员进行严格训练，尤其注重提升学员的身体素质和部队战斗力，还经常进行野外演习。教学过程中，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军官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据教育团学员杨先培在其文章《朱总司令和军官教育团》中回忆：“他经常把当时的国内外时事讲解给我们听，使我们懂得很多问题和革命道理，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教育我们不要光顾个人利益，个人升官发财。同志们在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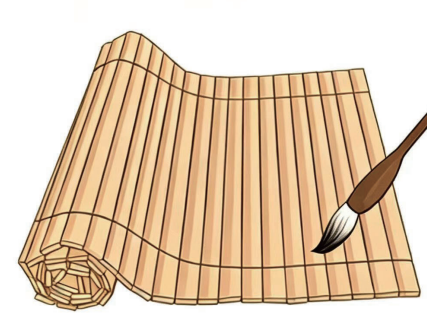
的启发教育下，觉悟都有极大的提高。”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1927年6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形势更加严峻，当朱德在得知朱培德准备“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禁止工农运动，宣布南昌戒严”的消息后，他迅速将军官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部队外，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做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鄱阳湖周围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从事工会、农协工作，有的学员还担任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赵镗于南昌起义爆发后奔赴前线，被编入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后又随军转战三河坝、参与湘南起义并走上井冈山。1927年春转入军官教育团的周建屏在南昌起义中，随教育团奉命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和歼灭驻地附近的敌人，1929年他奉命前往赣东北，与方志敏一同建设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十军、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朱德的带领下，军官教育团学员约1个营的兵力共400余人参加了起义。由于军官教育团兵力薄弱，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参加起义的学员被安排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进贤门、小花园等方向的敌军，担负警戒、控防任务，配合主力作战。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贡献，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朱德军官教育团的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大革命后期为江西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并为南昌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办学实践也为党此后开展军事教育、培养革命军政骨干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色记忆



《诗经》中的天下观念

□ 邱诗越

“天下”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不仅具有地理疆域的含义，而且承载着一套蕴含秩序、价值与认同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视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录了这一观念的早期形态，为我们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中的这句千古咏叹，描绘了约3000年前周人观念中的天下图景。《诗经》所呈现的天下观，并非单纯的地理认知，而是关于疆域、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整体看法。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与精神气质。

《商颂·玄鸟》有言，“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诗句既宣示王权疆域，又承载着一抔空间想象与文化认同：王畿居中，礼序由内向外层层推展，远及四极八荒。在周人看来，“天下”并非诸多邦国的简单并存，而是有中心可依、有边界可循、有秩序可守、有归属可系的整体性空间。疆土虽广，终归一统；生民虽众，同属一域。

《诗经》中反复出现“四方”

“四国”“万邦”等意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周人对于天下的想象。《大雅·民劳》有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中“中国”与“四方”对举，既标出空间边界，也体现了二者内在的关联。以中心区域的安定维系四方的安宁，反映出把“天下”视为一体的空间意识，承载着修己安人、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诗经》以鲜明而笃定的文辞，把分散的空间想象凝聚为天下一体的共同认知：天地之内，虽有远近之分、尊卑之别，且诸多差异并存，但万物万民同归于一套秩序，共处在一个完整的天下之中。这一整体性的空间意识，构成后世“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人依托具体的政治实践，将抽象的天下观念转化为现实政治秩序。《大雅·江汉》载：“式辟四方，徂我疆土。”《大雅·崧高》载，“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开疆拓土巩固边陲，分封诸侯以固根基，营建都邑以定封疆。《诗经》以诗存史，记录了周人建构天下的宏大愿景。“四方”“天下”等语汇的演变，不只是词语内涵的变化，更是早期华夏由多元邦国迈向秩序一统的观念见证与历史记忆。

《诗经》中的天下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人将德行视为王权统治正

当性来源的理念。《大雅·文王》载，“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篇以商周更替为例，说明天命无常，可能转移，劝诫统治者要敬天法祖、以殷为鉴。《大雅·皇矣》有言：“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天俯瞰四方、洞察万民，评判君主贤愚、天下治乱的依据，不在于权势强弱，而在于能否安定民众、修德律己。在周人的观念里，统治者唯有崇德守礼、体恤生民，才能承天命而安天下。《诗经》多次称颂文王、武王，称引“聿修厥德”，提出治理天下者先要修持自身，安天下者先要体恤民众。天下的稳固，不在于兵备强盛，而在于德行深厚；王权的正当性，不依仗强大的武力，而植根于德行持守与民心所向。修德，则天命归附、天下安定；失德，则天命转移、天下失序。这一认识将德行确立为维系天下秩序的核心，由此形成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在《诗经》的思想视域中，“天下”也是人伦秩序与自然法则的统一。《大雅·烝民》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化育万民，世间万物皆有其内在法则。统治者的使命，在于顺承天道、呼应

民心、遵循法度，使天下万民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礼乐诗教，是天下秩序赖以维系的文明根基。西周依托诗教与礼乐教化，化解方国、部族之间的文化隔阂，凝聚共识，塑造文化认同。《鲁颂·閟宫》用“莫不率从”言及周边族群，更以“淮夷来同”四字点明要义。“来同”意味着主动归服，是对共通秩序与文明的接纳，而非武力压服下的屈从。《大雅·生民》以周人始祖后稷的功业凝聚族群血脉记忆；《小雅·鹿鸣》以“鼓瑟吹笙”的雅乐敦睦邦国交往情谊。风、雅、颂各篇，或出自王都，或采自远方，体式参差、声调各异，却共同承载着一套礼乐精神与价值理想。

《诗经》所呈现的天下想象，反映了约3000年前华夏先民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天下的看法，其中蕴含的天下归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天下观念，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我工作单位与颐和园隔路相对，站在单位主楼顶上，就能看见颐和园的佛香阁。那时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习惯性地说“在西部”；如果再问，就说是颐和园附近。

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地理坐标，而非一座优美的园林。我真正走进它，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那天下午，同事的校友来访，我们便一同陪她去颐和园。我们从东宫门进去，经过仁寿殿前向昆明湖边走去。深秋的昆明湖，水色澄碧，微风拂过水面，漾起层层细波。我们三人租了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向十七孔桥方向划去。船桨在我的手中起起落落，水声与笑声在湖面上温柔交响。那是我第一次划船，也是第一次在昆明湖划船，那种感觉至今难忘。船到湖心时，我停桨，回望万寿山，佛香阁在秋日的斜阳里镀上一层金黄，琉璃瓦熠熠生辉，那恢宏的气度和典雅的古韵令我心旷神怡、沉醉其中。自从那次湖面泛舟之后，颐和园便成为我招待来京亲友的固定去处。于是，我与颐和园的交往，便从这一次次的“陪游”中，渐渐深厚起来。但在我的不同年龄段，我与颐和园相处的方式也在悄然变化。

20多岁时，我陪同学、陪朋友逛颐和园，是脚步匆匆，是“走马观花”，看的是风景、记忆的是碎片。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公园，而非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园林。我们走长廊、登万寿山、看铜牛，在石舫前合影留念，一路上看的是景观，聊的是旧事。走完颐和园，便算是尽了地主之谊。那时的我，对颐和园的了解，也仅限于从东宫门到石舫，偶尔爬爬万寿山，仿佛是一个匆匆过客。至于后山、西堤、苏州街这些景区，我几乎从未涉足。

30岁以后，颐和园便成了我带孩子散步的后花园。周末，我常常推着童车，从东宫门进去，沿着长廊走到排云殿前，边走边给孩子讲长廊梁枋上的彩画故事——桃园三结义、黛玉葬花、哪吒闹海。也不管孩子听不听得懂，我和妻子便自顾自地讲着，走累了便在长廊里坐下，看湖光山色，看游人如织。那时候的颐和园很少有零食卖，所以，每次出门前，妻子总爱往包里塞上一点零食，或是几块饼干，或是几颗糖果，以备孩子不耐烦时应急之用。孩子大一点，夏天我们就带着她去划船，冬天去滑冰。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已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还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乐园，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温馨家园。

40岁以后，孩子忙于学业，我们忙于事业，颐和园便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轿车进入家庭之后，我们的出行半径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周末的选择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北京作为一座千年古都，周边可去之处实在太多——怀柔的山、平谷的水、延庆的冰灯、密云的滑雪场，还有京郊那些星罗棋布的乡野民宿。于是，颐和园便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偶尔想起，也仅仅是为了春看绚烂的玉兰、夏赏娇美的荷花、秋闻馨香的桂花、冬寻凌寒的蜡梅。那几年，颐和园于我，更像是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知道它一直在哪里，却鲜有登门拜访的兴致。

50岁以后，孩子长大成人，远赴他乡求学。颐和园又回到了我和妻子的生活中，我们经常漫步在颐和园的每一个角落。但此时的颐和园，在我眼中又有了新的模样。年轻时看它，是艺术品，是风景；中年时看它，是生活的背景，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伙伴；而此时再看它，却多了一层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走进北如意门可以避开人流的拥挤，在山水之间、在曲径通幽处寻觅可以安放思绪的角落。虽然也常驻足小憩，但仍有一丝行色匆匆的感觉。那时的我，心里还装着许多对工作事务的思考，脚步虽踏进了园子，心却还留在国外。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到了耳顺之年。退休后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忙碌，时

与颐和园结缘

□ 刘志刚



间充裕起来。再去颐和园，我往往一个人去，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算哪里，看什么顺眼就停下来。因为住处离北宫门最近，我就从北宫门入园，沿着山后小道缓缓而行，脚下是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青石板上，像是谁不经意间撒下了一把碎金。我常常放慢脚步，留心观察颐和园的变化。游客比从前多了，不同肤色、操着各种语言和口音的游客摩肩接踵，穿梭往来，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平添了几分国际化的气息。我发现，那些南腔北调的喧闹，那些熙熙攘攘的身影，那些摆着各种姿态拍照的面孔，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外地游客，戴着耳麦听导游介绍的神情，仿佛都成为颐和园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看到这些，我不禁在心底涌起一些遐思和感慨。颐和园始建于1750年，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建，后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从1888年改名颐和园算起至今也已138年了。138年光阴，于这座园林而言，不过是树木长了一圈又一圈年轮，廊柱添了几道裂纹而已，山水楼阁历经百年风雨、见证时代兴衰，依然大体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而这座皇家园林也终于向寻常百姓开放，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颐和园由北京人的后花园，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会客厅，甚至成了各国游客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更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舞台。我从前看物，现在看人。看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看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饰，看他们在古园中留下的千姿百态，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秋日的昆明湖，湖面波光粼粼，西堤上的柳丝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我沿着西堤缓步行走，任凭秋日的阳光洒满肩头，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时光与温暖。望着湖对面的万寿山，佛香阁巍然屹立。十七孔桥如长龙卧波，横跨在碧波之上，桥洞与水中的倒影千变万化，构成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几只游船在湖面上缓缓驶过，只有眼前湖边的野鸭似乎在我致意。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蕴含的哲理与意境，竟在此刻于我心中有了新的体会。

